



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陈寒鸣）

(2006-2-9 9:30:52)

作者：陈寒鸣

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裨于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这类主要针对朱熹的攻诋道学之言论为孝宗“从之”。（28）其后，虽有尤袤进言，为道学辩护，希望朝廷“循名责实，听言观行”，勿以“道学”为伪，更不能以之罪人，但孝宗以“真伪相乱”为由而不纳其言。（29）于是，一场以道学为伪且为罪，并以之整肃学人的政治风波便勃然而起，甚至一些在学术思想上始终持守反道学立场、观念颇为纯正的学者也受到“道学”株连，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初，陈亮被捕入狱，即因“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而事实上，陈亮之人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本非闭眉合眼，朦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30）

淳熙十五年（1188年），又发生了一起以“道学”为罪名而弹劾朱熹的事件。兵部侍郎林栗与朱熹讨论《周易》及张载的《西铭》，并曾将其所著《易解》寄给朱熹以询意见，但双方意多不合，朱熹更批评林氏《易解》“大纲领处有可疑者”，遂引起林栗忌恨，甚至以扣政治帽子的方式刻奏朱熹：

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论，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将置列朝，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徒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不肯供职。是岂程颐、张载之学教之然也？望将熹停罢，以为事君无礼者诫！（31）

这种挟嫌报复，以至“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的做法，自然引起正直士人的反感和忧虑，如时为太常博士的叶适见到林栗上疏后，即作《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指出：“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词无实，谗言横生，良善受祸，何所不有！”然而，积习已成，风波难止，从政治局面上以“道学”为罪而打击异己、迫害士人的事端时有发生，到光宗朝竟出现了“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32）的非常态现象。这显然已绝非是单纯的反道学问题，更无任向学术意义可言了。

如此演化到庆元年间，终于发展至最为恶劣的地步。如庆元二年（1196年），刘德秀上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胡斥曰：“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毁圣德，几至大乱。”邵褒然亦谓：“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请诏大臣审察其所学。”宁宗深为此种舆论所动，乃下诏曰：“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即不准许那些被目为“伪学”的人士在朝为官，道学家以至并不主张道学的儒家学者遂在“伪学”的罪名下纷纷遭受沉重打击，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其后不久，这种从政治上打击迫害道学的行径再次升级，道学终由“伪学”而被斥为“逆党”。庆元三年（1197年）闰六月，草惜大夫刘三杰陛见时以十分激昂的语调论道：

今日之忧有二：有边境之忧，有伪学之忧。边境之忧，有大臣以任其责，臣未敢轻论。若夫伪学之忧，姑未论其远，请以三十余年以来而论之：其始有张栻者谈性理之学，言一出口，虚枯吹生，人争趋之，可以获利，栻虽欲为义，而学之者已为利矣。又有朱熹者，专于为利，借《大学》、《中庸》以文其奸而行其计，下一拜则以为颜（回）、闵（子骞），得一语即为孔、孟，获利愈广，而肆无忌惮，然犹未有在上有势者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为右相，欲与左丞相王淮相倾而夺之柄，知此曹敢为无顾忌大言而能变乱黑白也，遂诱而置之朝列，卒藉其力倾去王淮，而此曹益得志矣。其后留正之来，虽明知此曹之非，顾势已成，无可奈何，反藉其党与心腹。至赵汝愚则素怀不轨之心，非此曹莫与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禄，其为鹰犬以覬悻非望，故或驾姗笑君父之说于邻国，或为三女一鱼之符以惑众庶，扇妖造怪，不可胜数。盖前日为伪学，至此变而为逆党矣！（33）

这样一种全面而又残酷训寸学皆的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当时，不仅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然不敢入”（34），其弟子中以至有人“更名他师”，“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且，“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35）至于监司、帅守荐举改官，须在奏牍前声言此为“非伪学之人”；而科举时，应试者亦须在状上写明“系不是伪学”五字，（36）更成为普遍现象。这种使学者普遍受到迫害，

令士人个个自危的行径，自然同学术思想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有着本质区别。它丝毫无益于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只会造成从学术领域到政治领域万马齐喑的局面。南宋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正是随着“庆元党禁”之兴而告终结的吗？

三、历史的启迪

南宋时期，学术层面和非学术的政治层面所展开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交相迭起，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纷纭繁复的状况。拨开那层层迷雾，对之进行科学阐述后，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比如，诸种学术流派并行于世，且相互间不断展开思想交锋、理论争鸣，这是南宋时期学术文化呈繁荣发展之势的重要原因。在这种纯学术层面上思想论争的过程中，学者们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友好相待，如陈亮虽与道学有较深的思想理论分歧，对朱熹理学更多有批评，但他敬佩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光大儒道”（37），又称朱熹为“人中之龙”（38），并将朱熹、张栻、吕祖谦推许为“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39）；朱熹也盛赞陈亮“志大宇宙，勇迈终古”（40）。朱、陈二人在进行王霸义利之辨时，虽都各自坚持自己的思想，并对对方的思想理论有着严重批评指责，但他们不仅在私交上始终保持着正常情谊，时时互致问候，而且更能以平和的心态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学术建树。当遭遇到非学术层面的恶意攻击时，他们还能互相声援，如“台州案”兴，朱熹既同唐仲友相互奏论，还要遭受着林栗等人的诉毁攻击，而陈亮却能不避嫌疑地致函朱熹，声言：“台州一事，是非毁誉往往相半，然其为震动则一也。世俗日浅，小人举措已足以震动一事，使秘书得展其所为，于今日断可以风行草偃。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41）极大地表现出对朱熹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种学术思想论争中形成的良好风尚，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真正学者风范和人格精神，弥足珍贵，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透过以上论述，我们还可启悟到，非学术的政治层面上反道学（以至反对整个思想文化）的运动屡屡兴起，虽亦有所兴起的种种原因，但无论如何，以某种学术（如道学）为罪陷害、打击、压制学者文士，这乃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特有表现。其结果只会扼杀种种富有生气的学术思想，残害富有远见卓识的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家以至一般知识者，从而对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严重的桎梏作用。“庆元党禁”使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同样也应为我们的引以为戒，永远记取之。

[注释]

（1）南宋时期，道学内部亦有种种思想论争，以至形成学派之间的相互对抗，其中最著名者当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之间的抗衡。

（2）《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案语。

（3）同上，全祖望《艮斋学案序录》。

（4）《浪语集》卷二十三《答陈同甫书》。

（5）上书卷二十五《答象先（薛叔似）侄书》。

（6）《水心文集》卷十六《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7）《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案语。

（8）上书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9）《陈亮集》卷四《问答下》。

（10）上书卷二十八《与朱元晦书》。

（11）《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寄陈同甫书》。

（12）《陈亮集》卷四《问答下》。

（13）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乙巳春书之二》。

（14）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丙午秋书》。

（15）同上《问答下》，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6）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丙午秋书》。

（17）《水心文集》卷十六《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18）上书卷十四。

（19）上书卷五。

（20）上书卷四十九。

（21）上书卷工十七。

(22) 《习学记言序目》卷七。

(23) 《水心别集》卷三。

(24) 《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25) 在义、利之辨上，道学家实际是董仲舒“正谊（义）明道”论的发挥者。如朱熹说：“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又说：“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更不需思量第二者。……不要做这一边，又思量那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